

舊金山對日和約與台灣的國際地位—歷史回顧

陳荔彤 / 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教授

「舊金山對日和約」對台灣過去及現在的法律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無論從歷史及現實的角度，台灣不能再無視和約的存在，應建立正確、客觀的認識。

壹、重要歷史事實回顧

一、1945到1949年

在1895至1945年間凡五十年，台灣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太平洋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發令授權國民黨政府（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接受日本在台灣的投降¹。在1945年10月17日，國民黨政府的軍隊乘坐美國軍艦，並由美國航空母艦伴隨保護下到達基隆港。1945年10月25日，在遠東最高盟軍統帥的同意下，在台灣日軍對蔣介石將軍投降，同時，國民黨政府被賦予法律權能暫時軍事佔領台灣。此後，國民黨政府便事實控制台灣和澎湖，並於1945年對國際社會宣示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其曰：「在台灣（含澎湖）居民的中國國民身分自動被恢復（The Chinese nationalities of the residents on Taiwan were automatically restored）」

二、1949到1952年

在中國共產黨控制中國大陸之後，其於

1949年建立一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並宣稱北京為新政府的首都。在海峽的另一邊，蔣介石將軍和其軍隊撥遷台灣，並在1949年12月8日宣稱台北做為暫時的中國（China）國都。

中國兩個敵對政權的內戰持續，但明顯出現共產黨的軍隊肯定地將在短暫的未來擊敗國民黨軍隊。在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宣稱：

「美國傳統的對華（China）政策，係採門戶開放政策（the open-door policy），要求國際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這原則直到最近仍被1949年12月的聯合國大會決議案所再確認。」

美國並無針對福爾摩莎（即台灣）或任何其它中國領土預設立場，美國在此刻亦無對福爾摩莎有任何期待獲得特別權利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此外，美國亦無意願使用它作為軍事基地以干擾目前的情勢。美國政府將不會尋求任一事務而將導致中國的內部衝突²。

然而無可預期地在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杜魯門總統隨即於6月27日下令美國第七艦隊看守台灣海峽，以防止國民黨與共產黨軍隊互相攻擊對方。杜氏進一步發表聲明曰「福爾摩莎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到太平洋的安全恢復、和日本的和平協議訂定、或由聯合國衡量考慮之後。」次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周恩來提出聲明以反制杜氏前揭宣示曰：

「杜魯門於6月27日的聲明和美國海軍的行動構成對中國領土的軍事攻擊，係嚴重違反聯合國憲章……。無論美國如何採取阻礙行動，台灣是中國一部份的事實將永遠保持不變，這不僅是歷史事實，且一再被開羅和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後的局勢所確認³。」

在此期間，列強正與日本協商和平條約的訂定，惟由於中國的特殊狀況，在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與在台灣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皆未被邀請參加1951年的舊金山和平會議。這舊金山和約（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被列強締結於1951年9月8日，但中國和前蘇聯並未參與簽署。依照該和約的第二條b項，日本正式放棄台灣和澎湖的主權，然而，雖然日本官方正式放棄對台澎的「所有權利、主權名義和主張（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dores）」，惟其並未正式將上述領土主權移轉給任一國民黨或共產黨政府，或任一其它行政當局或政府。接續的事實是於舊金山和約生效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於1952年另行與日本簽訂一雙邊的和平條約，在約文中日本亦僅單純承認放棄對台灣、澎湖群島的主權名義，是否台澎主權移轉給締約主體的另一造並未在雙邊和約中載明。進一步，中日

雙方亦協議雙邊和約的適用範圍，在雙方皆讓步下，和約的適用範圍被定義在一項雙方換文（Exchange of Notes）內曰：

「關於今日日方與中華民國（the Republic of China）所簽署的和平條約，我謹代表我的政府提出貴我雙方達成合意共識：現行和約約款對中華民國而言，將適用於其政府控制之下現時所有領土，或從此時以後所產生之領土……⁴。」

貳、主要命題：依據舊金山和約，台灣是否屬於中國——the State of China的領土（不管是否由PRC代表中國政府）？若台灣被認定為中國的一部份，應始於何時？

前揭命題存在的理論基礎有二：

一、台灣不屬於中國

這理論的事實奠基於日本並未放棄台灣的領土主權直到1952年，亦未放棄而給予任何特定國家。國民黨政府在1949年出現在台灣僅係代表同盟國接受日本在台灣的親自投降。縱然基於開羅及波茨坦宣言要求台灣返還中國，且日本在對同盟國投降時接受上揭兩宣言之事實，然而，論者謂上述兩宣言純屬政治意圖聲明，不必一定產生法律效果。從而，杜魯門總統方於1950年宣示福爾摩莎的未來地位必須等到太平洋安全恢復、對日和議或由聯合國考量決定。

此論證基礎亦被下述事實所支持，即雖然聯合國從未（至今）考量過台灣的法律地位問題，但舊金山會議卻考量此問題並因此締結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在和約的

第二條訂定，日本一方面放棄其前所據的各領土權利主張，另方面卻有意而技巧地刪除任一或某些國家得予繼受各該領土主權。和約條文中之用語「放棄（renounce）」被仔細的選用，以避免任何法律隱涵台灣主權被賦予給中國（the State of China），縱然國民黨政府此時已有效控制台灣澎湖。進一步在195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締結另一之中日和約，承認其放棄對台澎諸島的主權名義而無任何說明主權歸屬。因此，論者認為台灣的法律地位乃屬未決，而將等待聯合國或其它可能機制的最後解決。

此外，某些支持此論證觀點者進一步指出很多國家在與PRC建立外交關係的雙邊協定上，渠等極力避免涉入表示台灣的法律地位，僅以某些無關痛癢的非造成永久性法律改變的外交辭令用語，即「認識、瞭解、注意或瞭解尊重」PRC之台灣為中國一部份之立場。從而，論者堅持台灣的法律地位將依據戰後的協定處理，亦即適用舊金山和中日和約予以解決，再依上述說明此兩和約並未指明日本移轉台灣主權予任一特定主體。

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無論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

這法律基礎是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辨明其從未接受過過去的馬關條約，因為它是不平等條約。在1972年的日本和中共建交公報中，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唯一的合法中國政府，且日本完全「瞭解和尊重（understands and respects）」中國的立場係「台灣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Taiwan is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而且日本進一步宣示遵守波茨坦宣言的意願。

參、適用舊金山和約，台灣的法律地位係屬未決狀態，將等待聯合國或其它國際機制的最後定位解決

在討論此類懸久未定案的國際法問題前，吾儕在認事用法程序上應預先明瞭排除實證法（Positive law）所可能產生「應然與實然或lex ferenda與lex lata」的混淆糾葛，以避免設定：因為某些結論似乎是正確的，所以結果肯定正確。例如，在台灣得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一事上，吾輒有以「這島嶼的人民將沒有聲言代表此實體」為理由似乎是錯誤的，蓋這理由並未跟隨台灣因此有入會的權利（當然台灣之不入會，則法律的邏輯推演並不因此得PRC有權利代表台灣人民在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甚而得有領土主權之結果）。吾儕不能掉入過度拘泥法律形式主義（legalism）的反面陷阱，而自我衍生效率難解的困境，例如一心一意執著於1951年日本放棄台灣領土主權法律效果結論，而遠離探究事實實在的政治實際和效應。

在1951年的舊金山和平條約及1952年的中日和平條約都明確地指出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的所有權利、主權名義和主張（rights, title and claim），然而上述兩個條約卻皆未特別指出誰將是這些領土主權的受益人（beneficiary）或受領者（recipient）。此項未決的地位曾被美國國務卿杜勒斯（Dulles）明白指出⁵：

「某些同盟國建議第二條不應只是依波茨坦宣言而劃定日本主權的界限，在第二條中還應該明確地指出前日本領土的最終處置。一般公認上，也認為這樣會比較適切，但是，如此

卻產生出某些至今尚無一致答案的問題。」

誠然，多數論者認為五〇年代初的上述兩和約在法理上已產生未決的法律效果，並直到今日⁶。此種實踐或許可視為特例，蓋涉及領土主權歸屬的條約文字之確定性要求應屬立法技術之首要，似非當初訂約主體過失疏落或不可預見之可能，顯屬囿於政治糾葛而欲條文文字留白保持緘默。前述兩和約之國際實踐，乃締約主體缺乏對領土主權歸屬的共識，惟仍能達成合意將領土主權默示未決狀態至長久的時間，此種國際立法技術並非絕無僅有，例如1923年拉斯安條約第十六條規定，在鄂圖曼（Ottoman即舊土耳其）領土主權下，「這些領土和島嶼的未來，將取決於有關締約當事國的同意解決。」⁷；在最近1998年伊利特里V.葉門（Eritrea V. Yemen）領土主權仲裁案中，仲裁法庭文義解釋上述條約曰「這些領土和島嶼的主權權利『保持暫時未決（remained indeterminate protempore）』，且此未決狀態將由未來某時期相關當事國加以解決，此意絕無現在（或未來）的秘密權利主張者（could be resolved by “the parties concerned” at some stage in the future—which must mean by present (or future) claimants inter se）。」⁸。

雖然由於同盟國間關於台灣、澎湖主權的最終處置無法達成一致，而將之留待給時間去解決便成為較好的方法。但是舊金山和約並未要求日本指明接收者的理由，主要係反映了美國在處理韓戰的全盤政策改變。原來，1950年1月5日，美國在關於台灣政策的聲明中，杜魯門總統（U.S. President Truman）明白地承認中國國民

黨政府事實上（de facto）佔領的事實，「在與這些宣言一致的情況下，福爾摩莎（Formosa）向蔣介石最高統帥（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投降，而且在這過去的四年間，美國和其他同盟國已經接受了中國在台灣島主權運作的事實。」⁹。然而，在僅六個月後的6月27日，亦即韓戰爆發兩天後的情況下，杜魯門總統下令美國第七艦隊防衛台灣、澎湖，不受到任何攻擊，並且戲劇化地對台灣地位發表完全不同的聲明，認為「福爾摩莎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到太平洋安全問題恢復後，與日本和平解決，或者由聯合國考慮而解決。」¹⁰。故自從1950年6月以後，美國對台灣法律地位的政策便一直是視為尚未決定，而美國此舉乃意欲建立一些避免台灣落入中共手中的法律障礙。

蔣中正總統堅信舊金山條約和中日和約中，「日本已放棄了對台灣、澎湖的主權，而且完成了移交這些地區給我們國家的程序。如果民主國家否認了他們自己曾簽署的開羅宣言，那麼不是現在，就是在將來，他們又怎能批評共產侵略集團撕毀條約和協定的行為呢？」¹¹。在支持蔣氏的看法下，萊特（Q. Wright）便主張在舊金山和約中，「不明白指出放棄台灣的主權接受者的情況下，蔣介石政府事實佔領（de facto occupation）的要求是被默許的。」¹²，而且他也認為台灣主權歸還中國的正式移交也已經發生了。但是詹安（J.P. Jain）卻否定了萊特的主張¹³：

「如果（萊特的）主張是正確的話，那麼西方國家所主張福爾摩莎應該經共同決定的看法，不論在聯合國內或其外部，都將失去其根據。」

綜上詳述，舊金山和約中，日本僅放棄對台領土主權，並未對該主權最後歸屬持任何看法，此種沉默條文或許無須推定為何國際有意將主權處於全然未決狀態，因當時事實情況已很清楚，彼時中國已經分裂為敵對政府而並無任一代表參加舊金山和會（the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或成為和約的簽署國，而英美兩國又分別承認北京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及台北的國民黨政府，從而若依照開羅和波茨坦宣言將返還中華民國之政策解讀，則舊金山和約至多僅能主張日本放棄台灣主權而歸屬於中國，實際留下空白未決的做法乃因無從知悉何方代表中國。爾後日本在美國影響下，又與中華民國簽訂1952年中日和約，此情況證據顯示日本事實有意將主權轉移中華民國手中而非其它主體。

以英法政府主張未決觀點為例，1955年英國外交部長安東尼·伊登（Anthony Eden）發表聲明曰「英國皇家政府觀點，台灣和澎湖之法律上（de jure）領土主權係未確定（uncertain）或未決（undetermined）。」¹⁴；又1966年英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在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代表時宣稱「福爾摩莎島的主權乃未決，在我們的觀點，由誰代表福爾摩莎參與聯合國亦同時未決。」¹⁵。1964年法國總統喬治龐畢度（Georges Pompidon）說明台灣的法律地位：「福爾摩莎由日本割讓出來，但並未歸屬於任何國家……（她的法律地位）必須由這些日子的其中一天來決定，將福爾摩莎人民的意願列入考量。」¹⁶。從上述英法政策聲明觀察，他們似非意指主權問題懸而未決，實當時無法確定究竟主權該歸屬於分裂後的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觀舊金山和約之

意指，並未構成主權立即移轉至上述兩實體的其中任何一造，應係未來保留選擇。

進一步分析，雖無明文明示移轉（transfer）或割讓（cession）給予中國，是否仍可藉由1951年舊金山與1952年中日和約各別或整體綜合觀察而推定主權賦予中國？或許吾儕可歸納出一項假設可能性，即由於日本是戰敗國的事實，當其再簽署1952年中日和約割讓台灣領土時，並無擁有決定移轉歸屬的權限，遂導致無法於中日和約內明文表示主權歸屬，惟仍可能為其心中真意乃保留給中華民國，從而這中日和約在日本的眼中，已構成一項法律上的同意（consent）或承認（recognition）的默示法律效果，即台灣領土主權應歸屬於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此觀點常被日本法院所採納，例如1956年日本高院的Japan V. Lai Chin Jung及1960年大阪地方法院的Chang Fukue V. Chang Chin Min案等案例之司法決定¹⁷；此外日本政府駐聯合國代表Akira Matsu在1966年於聯大指明日本政府在1952年的和約係由日本與中華民國簽訂，「在現在，台灣……是中華民國政府所在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統治過台灣島。」¹⁸。再者，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擁有日本割讓台灣的主權權利依據，並非是1952年之中日和約，因其政府在1949年建國後，並未承認中華民國有權利代表中國訂立國際性的條約如中日和約。綜上所述可得論證，設若中華民國係1951年舊金山和約的當事國（且中華人民共和國亦未參與），則日本縱然未於兩和約內指明誰是受益者，無可懷疑的中華民國將是和約內有意賦予權利的受益人，然而史實並非如此。吾人因此導出1952年的中日和約對

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而言，最多僅係日本個別造成默認（acquiescence），或至少是缺乏反對（objection）台灣領土主權屬於中華民國默示法律效果而已，此項中日和約無言結局的法理詮釋，仍難排除舊金山和約保留給予同盟國未來決定台灣地位的法律所謂之剩餘權（residual right），從而在同盟國未決定前之台灣法律地位仍屬未決狀態，是否屬於中國此兩和約並未提供堅實的證據基礎，惟吾儕可以斷言，她決不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因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者間並無任何法律臍帶連結。

肆、舊金山和約的台灣主權未決時效可至長久不定期間，但得於合理時間解決而終止

舊金山和約遺留台灣問題未決，隨即發生一項新問題：此未決狀態將於何時終止？回顧1950年美國杜魯門總統所宣示之將等到太平洋地區安全恢復之後簽訂和平協定或由聯合國考慮等語。然而舊金山和約並未如上述之拉斯安條約之第十六條明示領土之未來將由有關當事國協商解決（亦即未決狀態最後仍應解決），亦不規定由聯合國加以最後解決。是故，法理上自然產生舊金山和約的所有締約國皆已被賦予一項臆測的應遵行之權利與義務，亦即同盟國於二次大戰中勝戰的結果，使中國控制台灣將於一段合理期間終止，而台灣領土主權的問題將由他們以有利於同盟國的方式自行共同解決。而舊金山和約非但未訂明何時終止解決，甚至亦未規定當時台灣與大陸產生的事實狀況，再五十年後的今天仍與1951年訂約時狀況一致，台

灣仍控制於中華民國手中，而與現今控制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兩者分別控制台灣大陸個別獨立於國際社會，而可能仍將繼續下去。究竟當條約當初制定的規範繼續有效存在，而情勢發展的結果卻迥然不同於當初締約者原先預估之立法目的與功能，法律應如何適用？吾人只有尋求此特別立法的條約法與一般習慣法間之關係，特別立法的舊金山和約有賴習慣國際法的補強，當條約保留空白（lacuna）時得允許習慣法適切地加以補充適用運作，然而，台灣問題的未決情況已單獨地被舊金山和約設定產生，從而應無其他剩餘的習慣法則得以補充適用解決上述臆測與現狀的不一致。亦即依舊金山和約並未規定已決未決或如何解決，但其立法空白已產生未決狀態，又無法定終止時間，故未決時效可至長久不定之期間，並得於合理時點解決而終止，惟顯而易見此解決主體將取決於同盟國之手，從而美英等國尚非法律適格插手台灣的主權地位最後歸屬。

根據以上法律事實分析，我們可得到的結論便是，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台灣主權的訴求，根據舊金山和約或中日條約的規定，在國際法上應屬未決狀態。

伍、中華民國事實上的有效佔領控制產生的國際法效力：中華民國播遷至台灣，並使用台灣為取回「中國」的根據地，然而五十年來，其政府已經轉型從一個主張代表全中國的政府，成為一個僅有效統治台灣領土和人民的台

灣委任統治地 (mandate) 政府

中日和約中強調日本將放棄一切對台灣、澎湖地區的權利、主權名義和主張，這似乎暗喻了日本將歸還台灣、澎湖的領土主權給中華民國，亦即由於日本放棄在台灣、澎湖的領土主權，那麼中華民國便可合法地聲稱其擁有台灣、澎湖乃因事實上的管轄控制。因此自1945年起，台灣便已在中華民國的實際管轄之下，而產生實質國際法效果。

國際法承認依下列兩種程序而移轉領土主權。其一為依讓與的法則 (the rule of cession)：領土主權可經由正式的讓與由一個主權國移轉至另一國家。由此方式，日本取得在庫頁島、韓國、台灣和澎湖的領土主權；美國亦依此原則而取得路易西安那州和阿拉斯加州。如前所述，日本並未正式地將台灣、澎湖讓與給中國，所以無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均不能宣稱其依此讓與原則而擁有台灣、澎湖的領土主權。其二為依佔領的法則 (the rule of occupation)：領土主權也可移轉到另一個政府或統治當局，只要他們佔領了未併入任何國家的無主地 (terra nullius or res nullius) 或從未有任何國家宣稱主權的土地 (unclaimed territory)，並且顯示其有作為主權國的意願或意圖及有某些如統治當局般的實際運作及表現 (demonstrates the intention or will to act as sovereign as well as some actual exercise or display of authority)¹⁹。

是故有論者主張，1951年之舊金山和約關於台灣之領土在日本放棄後已變成無主地，因而得以適用國際法的佔領原則：同

盟國的一或數個交戰國佔領交戰中之領土，可能轉成有效的主權²⁰。事實上，舊金山和約同一相似史實，即日本割讓庫頁島給予蘇聯，然由於此島較小人口亦較少，適用無主地的法則可謂相當適當，然而台灣在昔時已有一固定的人口與穩定的政府，故適用傳統國際法的無主地原則難謂百分之百正確，例如1975年西撒哈拉 (Western Sahara) 案例指出，「在十九世紀後期，若領土上有部落或種族居住，其已有社會和政治組織將不能視為無主地。」²¹，然而，既然原來的統治者已撤走，則新接收佔領之政府仍將可以新身分宣示取得無主地，蓋新政府的出現與舊政府的離去仍有分割的時間點，無法阻卻該領土被歸類為無主地的產生。進一步推論，除非吾人肯定接受台灣地位保持未決觀點，否則觀察舊金山及中日和約訂定後之事實發展，一項合理解釋就是由於締約國的和約條款並未如理想預期，所以無論國民黨或共產黨任一政府的最後勝利控制台灣，可謂皆係代表全中國的控制，故日本放棄領土主權後已將主權賦予給行使有效管轄台灣五十年的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都企圖引藉這項佔領原則來主張其對台灣、澎湖的權利。基於此項佔領原則，中華民國主張其自1941年12月8日，當中國的對日宣戰並且廢止了馬關條約，中華民國便征服了台灣、澎湖並將之併入其領土範圍內，自此台灣、澎湖的主權應已從日本移轉至中國。不惟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基於上述理由而宣稱其在台灣擁有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駐聯合國代表吳氏於1950年11月28日於聯合國的演講中指出²²：

「當中國政府接受了日本在台武裝

部隊的投降並在台灣建立主權，台灣不僅在法律上（*de jure*）且在事實上（*de facto*）成為中國歷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自1945年後一直享有同樣的地位。由是，從1945年到1950年6月27日的過去五年中，從未有人對台灣在法律上和事實上均屬中國歷史上領土不可分割之一部份提出質疑。我們必須注意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澎湖聲稱其主權乃是基於其以國民黨政府的法律繼承者地位，而國民黨政府已經從1945年10月25日，依據佔領原則確定其在台灣的權利。」

依據某些法律學家的見解，如史密斯（F. Smith）、歐康耐爾（D.P. O'Connell）、史塔克（J.G. Starke）和奧本漢（L. Oppenheim），國際法對「佔領」原則的定義係指在新發現或被廢棄的領土上，作為主權國的意願或意圖，及有足夠的主權的運用和表現，從而取得其所有權（the taking possession of either a newly discovered (*territorium nullius*) or abandoned territory with the intention or will to act as sovereign and the adequate exercise or display of sovereignty）；以及適用一些有效的試驗來決定是否佔領已經發生；再者，持有事實和行政權的運作是兩個構成有效佔領不可或缺的事實（possession and administration are two essential facts that constitute an effective occupation）。除此之外，依據勞德派特（H. Lauterpacht）、歐康耐爾（D.P. O'Connell）和斯瓦金柏格（G. Schwarzenberger）的見解，戰後持有戰時之占領地一段時間後，國際法特別承認另

一項「使交戰國於戰爭結束之際以佔領地為領土之原則」（the principle of *Uti Possidetis*），即如果戰爭結束後，其征服領土之割讓雖未成為其和平條約的條件之一，在法律上，此領土即可因其被戰勝國持有、占據而被併吞。在 *Guillermo Alvarez Y. Sanches v. U.S.* 案例中，此項 *Uti Possidetis* 原則輒被條約的參與者用來請求其在戰時憑藉武力獲得的佔有權（being used to signify that the parties to a treaty are to retain possession of what they have acquired by force during the war）。綜據上述，在台灣這個案例中，中華民國於二次大戰戰後將台灣併入其領域而佔領之，並且運行其有效的管轄權，從而中華民國除了自己聲稱依據佔領原則之外，亦可主張適用 *Uti Possidetis* 原則，因為台灣領土主權的改變乃是由於戰爭²³。

然而，雖然就歷史觀點而言，佔領原則及 *Uti Possidetis* 法則均為國際法所承認，而以之作為領土主權移轉的形式。但是，這些取得主權的理論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仍有爭論，因為使用武力移轉領土主權的行為可能為國際法所禁止。學者陳氏（T.P. Chen）認為上述兩項原則尚有法律之疑慮，他指出²⁴：

「這種理論可以輕易地就近來在基本社區政策（basic community policy）方面的發展來加以推翻，因為這些政策已對由征服及合併手段而取得主權的合法性產生質疑了。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有許多多邊協定（multilateral agreements）創設了一項義務，即簽約國不得承認以武力移轉其所取得領土。這些協定即第一，國際聯盟盟約（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第二個條約乃係依照1928年的凱洛格—布里安(Kellogg-Briand Pact of 1928)條約所訂定的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Article 2(4)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雖然該凱布條約和聯合國憲章並未明示地課予簽約國不得承認憑藉武力所獲得的領土主權，但是因征服而取得主權之違法性，卻可由條約的條款、精神及目的明顯地演繹出來。此條約對會員國及非會員國國家具有相同的拘束力。」

此外，縱使假定上述佔領原則是可行的，那也只能證明由在台灣對日作戰勝利的國家所聲稱的權利是正當的；總體而言，台灣被視為主權移轉給同盟國全體。根據學者詹安(J.P. Jain)的看法，「日本並非只對中國投降，而是對同盟國整體投降，基於此，福爾摩沙島可能無法被認為只被一個權利當局(如中國)征服或合併」²⁵。因此，有關中國主張其對台征服及併入領土的論點尚難具說服力。

然而，奧本漢(L. Oppenheim)和狄恩(A. Dean)主張以佔領取得領土之方式是有效且具優勢的。在此案例中，他們將武力征服及合併的檢驗置之一旁，而僅宣稱中華民國係依據佔領的原則而取得台灣領土的合法主權。歐康耐爾也推斷：日本放棄台灣領土主權以後，中華民國在台的權利，將由交戰國之佔領形式轉換成擁有其明確的主權，循此，中華民國便可將台灣、澎湖的所謂遺棄地(terra derelicta)併入版圖，因為尚無任何國際法的學理能駁斥這種主張²⁶。此外，中華民國也可基於時效原則(the principle of Prescription)而取得台灣主權，威爾森

(G. Willson)曾指出，領土的主權可因在一段時間內，未曾中斷且無人爭奪(uninterrupted and uncontested)的佔有一領土而獲得²⁷；奧本漢也主張：國家可因在一領土上持續且未被侵犯(continuous and undisturbed)此運行其主權，經過一段足夠的時間後而取得其領土主權²⁸，正如摩洛羅(F. Morello)所稱：中華民國透過時效原則，對於台灣、澎湖有合法的權利，因為它對此地和平、繼續地實際佔領與管理一段很長的時間²⁹。依據以上的分析，台灣、澎湖地區在戰後係無主地(terra nullius or res nullius)中華民國由國際法的佔有取得原則，取得其合法地位。

進一步將佔領原連結1951年舊金山和約析述，近頃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在1997年的哥巴契可夫V.拿記馬羅仕計劃(Gabcikovo V. Nagymaros Project)案例中，法院拒絕支持當事人所宣稱的條約近似適用法則(Approximate application of treaties)，但其判決意旨則謂若條約繼續有效存在，惟其條款並未被忠實履行，則「最需要者……應視已發展出來的事實情勢(如ROC佔領台灣)，將之放置於預存或發展中的條約範疇內，此係為了完成契約的目標和目的(object and purpose)。」³⁰；復依據維也納條約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條約必須信守法則(the rule of pacta sunt servanda)，國際法院曰「第二十六條涵蓋二要素，兩者同等重要，每一有效拘束當事國的條約必須依誠信原則(good faith principle)忠實履行；後者如同此案例，條約的目的係雙方當事國簽訂的誘因，此甚優於文字的適用。誠信原則課以當事國依合理的手段與

方法，俾造成條約的目的（purpose）。」³¹。在1951年舊金山和約中，和約條款的目標（object）在於日本放棄台灣領土主權後移轉給「中國」，因而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誰有權取得主權權利，將以努力奮鬥至能控制全中國為指標，然而事實顯示此種全面控制競賽已陷於困境。假若中華民國無法依任何法律程序獲得領土主權權利，則其實際控制佔領台灣五十年，實已產生舊金山和約中領土放棄條款所揭示的「目標與目的」，從而中華民國領土主權的佔領取得應被承認為有效。

最後，吾人可提出結論：中華民國能依佔有取得原則和*Uti Possidetis*原則直接且有效地控制台灣、澎湖，並進而建立領土主權，縱使前述兩個和平條約對移轉領土缺乏明確條文，中華民國仍可合法正當地擁有台灣、澎湖的法律主權（*de jure sovereignty*）。是故，只有中華民國對台灣的具體事實上有效佔領管轄，構成唯一堅實的國際法基礎，適法地在國際社會主張中華民國台灣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陸、適用舊金山和約，台灣領土在1949年後並非中國（the State of China）的一部份：1949年以後，法理上中國已分裂成如兩德、兩韓的兩國，中華民國實質領土嚴格限縮在台灣而成為新國家，這是神聖而無可挑戰的法律原則

在1945年，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藉由美國艦隊的協助，首先登陸台灣，奉遠東

同盟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的命令，接受日本政府的投降，此受降佔領的事實，僅為交戰國佔領（*belligerent occupation*）的地位，中華民國單純獲得同盟國之授權而代表同盟國佔領台灣³²，在法律性質上至多僅係「信託（trust）」的地位。接著，國共內戰後分裂，1949年，原定都於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經幾次內戰遷都後暫時定都於台北，同年共產黨的叛亂團體亦向國際宣示正式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於北京，此時台灣的法律地位仍應延續由中華民國政府行政託管的信託屬性，並無改變。在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原本可望藉和約法律效力將台灣領土賦予中華民國政府，並正式取得主權而中斷信託地位的希望並未發生，依和約效果觀察，台灣法律地位仍應屬於未決，惟因日本於和約中明文放棄台灣領土主權，方使中華民國取得國際法所謂的無主地，並經相當長期和平佔有而無同盟國或其他國家的強烈挑戰，終使中華民國依據佔領原則，排除信託地位而獲得台灣的領土主權。

依上述，進一步分析下述攸關台灣法律地位難解之問題，即：決定1949年以後台灣的政府代表是否為中華民國（the Stat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政府；且此時以後的台灣是否為中國的一部份？回答上述問題面對的困難有二：一、日本曾經佔領統治台灣五十年的歷史事實，因而造成台灣領土主權屬於中國的斷層被忽略；及二、當1949年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於北京，已播遷至台的中華民國並未及時「主張（claim）」為分裂獨立的中國，且所擁有的領土僅侷限於台灣與澎湖，未作此主張將導致無有效的領土。依第一點

言，日本佔領的事實已割裂台灣的法律地位連結中國的法律效果，再者，1945年在台灣接受日本投降而佔領台灣的係中華民國，此事實的發生早已在1949年中共建國之前，從而台灣的回復到中華民國手中，顯已與建國於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毫無交集，從而在法律推論上台灣絕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顯屬明確，此時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已從他國——日本轉手取得主權而形成新的獨立政治實體，得轉而形成主權獨立的新國家，只要中華民國適時切斷與大陸的臍帶，即不再主張代表全中國，則台灣已非中國之一部份；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代表全中國包括台灣，純屬空言主張，質言之，並無任何事實根據與法律基礎；中華民國接續主張作為全中國政府的代表，乃人治色彩下的產物，在國際法上可謂未落實表彰「真實有效的連繫（Authentic and effective link）法則」，其主權範圍深入中國大陸的主張，必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主張之管轄範圍競合重疊，產生法律交集衝突，必陷入中共的陷阱而造成自身的政治困境。至於前揭第二點乃造成今日台灣國際法律地位混淆不清的關鍵所在，自1949年起，中華民國在大陸的領土已經喪失，所取得的台灣領土又屬新獲得，縱兩和約對主權移轉交待不清，仍難排除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權權利，然而中華民國怠於主張係新的國家代表台灣，則已形成新的政治實體必無法獲得國際社會承認為新的國家。綜上所論，1912年建立於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於1949年後繼續存在在台灣而其實質領土已從整個中國減低至台灣。

從上所述，自1949年後中華民國已成新的主權獨立國家，管轄領土侷限在台灣，

然而中華民國政府並未主張，從而台灣在四九年後是否仍為中國之一部份，或屬於中國之領土？在今日若以「中國——the State of China」作為中國的國號將造成處理兩岸問題的困難，因其並非正式的國號。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僅有由中國國民黨政府統治的中華民國存在，她乃代表全中國且係唯一既存的「中國」，此時的中華民國乃中國，或中國乃中華民國應無疑義。在1895年，當時的滿清中國與日本簽訂中日馬關條約，日本取得台灣的領土主權，然而五十年後的中華民國政府所代表的中國，在盟軍的授權下，接受日本在台灣投降，故此項受降得以使台灣併入中華民國的或中國版圖。領土主權回歸「中國」應在舊金山和約中明示規定，乃國際法對領土主權變動的基本要求，然或許日本在舊金山和約的放棄台灣領土隱涵主權權利賦予給「中國」，蓋因和約的受益者留白，僅得作上述推論，然而這問題仍一定發生「中國」究指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時中國已分裂，論者難免有各種不同的見解，若非指明係那一中國，則中華民國似乎不能辯稱台灣在1949年政府遷台後從未成為中國之一部份，否則其將有陷入被否認擁有台灣主權的危險，因其一再主張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這是台灣面臨的兩難，然而在法理上台灣縱無從肯定回歸「中國」，惟確定已返回到中華民國；又1945年的受降由當時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所接受，故台灣從過去至今日從未屬於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蓋其獨立建國係在1949年，且建國後的共產黨政府從未統治過台灣，其並無任何國際法基礎主張擁有台灣。綜上論述，台灣自1949年以後至現今，似乎從未是中國

(the State of China)的一部分，蓋其有新的主人——中華民國。

1949年中國分裂成兩個中國的政治實體，皆對國際社會宣示係代表中國的唯一真正的合法政府，並戮力為唯一合法中國代表權的國際組織競賽，兩個政府各自管轄大小不同的領土，然而，兩個競爭的當事人皆毫無意願就其各自受限管轄控制的領域，產生各別新的主權獨立國家。中國與幾乎同時分裂的德國和韓國，皆為國際社會分裂的國家，然而三個國家分裂的原因與分裂後主張的狀況各有不同，茲將其區別說明如下，或可收他山之石可攻錯之效。

德國：兩個政治實體即德國聯邦共和國（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FRG，西德）和德國民主共和國（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Germany—GDR，東德）分裂在1949年5月，起初在被四強（英美法蘇）軍事佔領（occupation bellica）時，兩者的法律地位皆非為獨立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然而西德於1952年與西方三列強簽署協定後，其法律地位已轉變而成主權國家。關於兩德的統獨問題，與台灣情況最大的差異在這四列強擁有對最後德國領土安排的權限；但是台灣的問題則如前所述，即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已保留給同盟國剩餘權來決定台灣的法律地位，法律基礎係處於未決地位。

韓國：原來兩個中國與兩個韓國政府訴求相似，韓國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Korea，南韓）與韓國人民民主共和國（the Democate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北韓）政府皆各自主張代表整個韓國，在1948年，聯合國第三次大會第一

九五號決議案宣示承認南韓為代表韓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然而，爾後歷史發展所形成的法律結果，兩個中國與兩個韓國卻迥然有別，首先兩個韓國政府的存在在國際上比在台灣中華民國更明確、廣泛地被國際社會接受，此外，被承認為合法政府的南韓對其兄弟之邦北韓的態度，亦比中華民國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採取較具彈性的政策。在1970年以後，南韓已願意接受北韓為協商談判的對造，並且維持與承認北韓為主權獨立國家的第三國之外交關係，截至1990年止，與南韓維持外交關係者為125國，與北韓則有102國，同時與兩個韓國建立雙重外交承認的則有68國，雖兩個韓國皆有意願且致力於統一，然聯合國在1991年卻承認有兩個主權各自獨立的韓國，並允許其加入聯合國。其次，縱然兩個韓國與兩個中國皆訴求得有一個政府能代表真正的韓國或中國，然中國的實踐經驗卻顯示，在1971年聯合國第二十六次大會的二七五八號決議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安全理事會的權利，並且排除中華民國的聯合國代表權。

柒、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台灣領土是中國的一部份，且其係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這是國際社會無法承認的政治神話

在檢視台灣是否已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新國家，吾儕應有必要審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觀點以得公允，依中共的主張，台灣為中國的一部份，且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北京固然同意中華民國的主張，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恢復台

灣的領土主權，且中華民國係當時唯一既存的中國，然依中共的意見，「在南京的中華民國最後已被中國人民所推翻」，並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產黨政府所取代，依照國際法的繼承原則，關於全中國的領土，包括台灣，已由其取得主權。然而基於以下兩個事實中共的主張難以成立，一、日本在1951年舊金山和約正式放棄台灣領土主權時，中華民國政府已控制管轄台灣，且其後的1952年中日和約之中方代表為中華民國；二、中共自1949年獨立建國起，從無一日在台灣行使過主權。循此觀點，日本在1972年9月28日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時，其對台灣之領土主權的條款並未具體表示台灣的法律地位，僅於建交公報敘述：日本政府完全「瞭解和尊重（understands and respects）」中國政府的立場為「台灣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³³，此種迴避承認（recognition）的外交用語，並未造成任何台灣領土屬於中共的法律效果。其次，中共常辯稱國際社會已承認台灣屬於中國的事實，然從中共所提出得以支持其主張的歷史事實皆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前。一般而言，現今國際社會大部分國家基於國際政治現實，可謂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之合法政府的所謂一個中國原則（the One-China Principle），惟此一個中國原則專指1949年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所轄領土限於中國大陸，要與台灣無涉，由於台灣的中華民國之不符實際管轄領土的另類訴求，僅與其是否得以快速成立新的主權獨立國家以建立其國際地位有關，尚不得解為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部份。

現今國際社會絕大部分國家由於不願承認北京享有台灣領土之主權，而對此問題

的處理採較強硬的態度，因而那些模稜兩可的字彙，如「認知」（acknowledge）、「注意」（take note of）、「瞭解與尊重」（understand and respect）及「尊重」（respect）一再出現在雙方官方公報中³⁴。對中共而言，此種讓步殊屬不智：對當事人各國而言，頗符合國際政治實際；而對中華民國台灣而言，將更可彈性決定自己的未來。特別指出者乃加拿大及一些其他國家之用語是「注意」（take note of）北京的立場，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份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省。加拿大是1970年代初期世界上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建立外交關係，且附隨台灣領土主權條款的第一個國家，由於加拿大為避免於七〇年代起自由世界在台灣問題上創設承認台灣為中共領土一部份之先例，故不願認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對台灣的領土主權³⁵，結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加拿大之長期外交談判後，「注意」的措辭便出現於公報中。事實上，自1970年後，美國與其主要盟國，例如日本、義大利、比利時、澳大利亞、西班牙、菲律賓與泰國等，在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國家承認與外交關係上，加拿大式的規避方式已成為上述各國的模式。在聯合國於1971年10月25日的二七五八號大會決議案中，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的政府，依憲章規定為安全理事會的永久會員國，且排除在台灣之中華民國代表權，然對台灣的法律地位則保持緘默；此決議案的法理闡釋，僅得解為依一個中國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中華民國不是，蓋其對台灣法律地位一致如同舊金山與中日和約之有意留白，從而亦無法學方法漏洞補充之適用餘地，在法理上並不

構成承認台灣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捌、結語

單純適用舊金山對日和約，台灣法律地位係屬未決狀態。在法律驗證下，舊金山和約間接否認台灣乃昔日的中國（the State of China）之一部份，中日和約更直接否認台灣為中國之領土，從而台灣國際地位「應」為主權獨立國家。

1949年來，中華民國政府有效控制台灣，並已從原本主張代表全中國之政府，轉型為接受台灣人民付託之台灣統治政府。然今日台灣國際地位問題，尚非僅以中華民國已接受台灣人民付託之有效統治台灣為已足，必須是在台灣的那些人民所代表的中華民國能否視自己為新的國家。換言之，台灣人民需要以口頭或文字向國際社會宣示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以完成國際法法律程序。中華民國政府於1991年中止動員戡亂時期，停止內戰，不再視中共為叛亂團體，此宣示在建立兩個對等地位實體，變質承認非法為合法，但絕無等同於宣示台灣為分離國家地位（Statehood），並無獨立之效果。進行憲法改革，俾建構以台灣為主體的立法和行政機制之民主代表性，此行為雖可能係建立一分離國家的先決條件，然在國際法上尚屬不足，蓋國際法的國家資格並不能單純以其內部憲法架構作為檢驗基準，而係一些國際法原則的適用，以驗證國家存在與否？尚非僅以國內憲法的認同為已足，在國際社會上不同的政治實體存在，並各自擁有個別的憲法系統，並非必然成為國際法上的兩個國家。

在舊金山和約台灣主權未決的基礎下，美國與中共的上海公報、建交公報與台灣

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皆未承認台灣領土係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此乃延續和約的未決法律狀態到現在。事實上，「中」美關係存在最困難的問題亦是台灣法律或國際地位問題，這已實質獨立的自治島嶼而北京仍考慮為其一部份並誓言必要時將以武力解決，然布希政府在上述台灣主權獨立地位的邏輯架構下，亦誓言將「採取任何行動（whatever it takes）」以防衛台灣，進而美國以TMD防護台灣皆將不致違反國際法。

在和約未決狀態下，台灣問題國際化是法律層面推論的必然結果，除非國際社會的政治層面另有考量。從而將台灣問題交付司法決定或許是最好解決方式之一，惟至今並無跡象顯示最近的將來有此可能；又證據顯示此案或有可能提交聯合國大會審議決議，但此種決議案並無拘束力，若有損及台灣利益，中華民國自應不予接受。當然，本案例或許不必進入國際法院或聯合國機制前，雙方即能協商談判而獲得圓滿解決，此時雙方應本善意誠信（Good Faith）原則，解決方案應以現狀下台灣人民既有法律保障為首要，並應為國際社會多數國家所接受，俾建立和平穩定的國際新秩序。（附記：由於時間所限，本報告為重點摘錄本人舊作而成；又本報告純係本人主觀觀點的客觀分析，文責自負。）

【註釋】

1. See Article 1(a) of General Order No. 1, Military and Naval of the Office of the 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Allied Powers which provides:

The senior Japanese Commanders and all ground, sea, air and auxiliary forces within

- China (excluding Manchuria), and Formosa and Great Indo-China north of sixteen degrees north latitude, shall surrender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Directive by the Office of the Supreme Commander of Allied Powers to the Japanese 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 reprinted in Marjorie M. Whiteman,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 (1964), p.488.
2.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22 (1950), p.79.
3. PRC's Foreign Minister Chou En-lai's Statement of June 28, 1950, reprinted in Hungdah Chiu (ed.) *China and the Taiwan Issue* (1979), pp.221-222.
4. Exchange of Notes, No. 1 from the Japanese Plenipotentiary to the Chinese Plenipotentiary, reprinted in Hungdah Chiu,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Taiwan: Document and Analysis* (1973), p.247. 原文為 "In regard to the Treaty of Peace between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signed this day, I have the honor to refer, on behalf of my Government, to the understanding reached between us that the terms of the present Treaty shall, *in respect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be applicable to all the territories which are now, or which may hereafter be, under the control of its government...*" (emphasis added)
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125 (1951), p.454.
6. See 陳隆志及 Harold Lasswell 合著 "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1970) ; 彭明敏、黃昭堂合著「台灣在國際法上地位」(1993) 與「台灣の法的地位」(1976) ; 另公法教授李鴻禧似亦有此見解。
7. *League of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28, p.23.
8.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Decision of 9 October, 1998, Eritrea V. Yemen,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Vol.28, p.23.
9.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50-1955: Basic Documents*, Vol. II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7), pp.2448-2449.
10. *Ibid.*, p.246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23 (3 July, 1950), p.5.
11. *Free China Review*, Vol.5 (3 November, 1955), pp.52-53.
12. Quincy Wright, "The Chinese Recognition Problem,"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9 (1955), p.332.
13. J. P. Jain, "The Legal Status of Formosa: A Study of British, Chinese and Indian View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7, No.1 (January 1963), p.37.
14. Marc J. Cohen and Emma Teng, eds. *Let Taiwan Be Taiwan*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Taiw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0), p.108.
15. 21 U.N.GAOR, U.N.Doc.A/PV.1481, p.9. (1966); *Ibid.*, p.109.
16. New York Times, April 24, 1964; *Ibid.*
17. Hungdah Chiu,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tatus of Taiwan," in Henckaerts, (ed.),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tatus of Taiwan in the New World order* (Kluwer, 1996), pp.7-8.
18. 21 U.N.GAOR, U.N.Doc.A/PV.1479 (1996), p.2.
19. Charles Cheney Hyde, *International Law Chiefly as Interpreted and Applied by the United States*, Vol.1, 2d revised (ed.) (Boston:

- Little, Brown, 1951), pp.356-358.古典國際法論著指出獲得領土的方式有五種，即先占（occupation），添附（accretion），割讓（cession），時效（prescription）及兼併（annexation）。
- 20.D.P. O'Connell, *op.cit.*, p.415.歐氏使用無主地非“res nullius,”而係遺棄地“terra derelicta.”
- 21.I.C.J. Reports, 1975, p.39.
- 22.U.N. Security Council, *Official Records*, 527th Session (28 November, 1950), p.6.
- 23.Frederick Smith,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Toronto and Paris: J.M. Dent & Sons, 1918), pp.101-105; D.P. O'Connell, *International Law*, Vol.1 (London: Stevens; Dobbs Ferry, NY: Oceana, 1965), pp.468-83; J.G. Starke,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9th ed. (London: Butterworth, 1984), pp.153-160; Laurence Oppenheim, *op. cit.*, pp.557-563, Hersh Lauterpacht, *International Law*, Vol. 1, E. Lauterpacht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123, 269; D.P. O'Connell, *International Law*. Vol.1, 2nd ed. (London: Stevens & Sons 1971), pp.426-427; George Schwarzenberger, *International Law*, Vol.3rd ed. (London: Stevens and Sons, Limited, 1957), pp.289, 293, 304-305; Guillermo Alvarez Y. Sanches V. U.S., 42 Ct. Cl.458.
- 24.Tung-pi Chen, “Legal Status of Formosa,” *Philippine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4 (1956), pp.126-27.作者陳氏在此文中尚引用甚多其它條約和文件，以支持其觀點。
- 25.J.P. Jain, *op. cit.*, p.34.
- 26.Laurence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A Treatise*, Vol.2, h. Lauterpacht ed. (London and NY: Longmans, Green & Co. 1952), p.611; Arthur H. Dean, “International Law and Current Problem in the Far East.” *Proceedings of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55), pp.88, 95-6; D.P. O'Connell, *op. cit.*, p.34.
- 27.George G. Wilso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3rd ed. (St. Paul, Minn.: West Publishing Co., 1939), p.79.
- 28.Laurence Oppenheim, Vol.1, 8th ed., *op. cit.*, p.576.
- 29.Frank P. Morello,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tatus of Formosa*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6), p.82.
- 30.L. C. J. Reports, 1997, p.76.
- 31.*Ibid.*, pp.78-79.
- 32.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22 (1950), p.79.
- 33.*Peking Review*, October 6, 1972, pp.12-13.
- 34.Lyushun Shen, “The Taiwan Issue in Peking'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70s: A Systematic Review,” *Chines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Affairs*, Vol.1 (Taipei: Chinese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82), pp.77-78.
- 35.John D. Harbron, *Canada Recognises China* (Toronto: 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74), p.10.